

DOI: 10.12046/j.issn.1000-5285.2025.03.002

如何读懂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审视

刘占虎

(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摘 要: 一切历史的精华最终表现为思想史。马克思以“改变世界”的“科学世界观”揭示“历史之谜”, 创立指引人类解放的“历史科学”。理解和阐释马克思“历史科学”的内在规定, 需要回到承载其思想生成的文本结构和历史语境, 赋予经典诠释以语境支持和思想根基。西方马克思学试图以实证的“科学主义”来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本真, 由于强制阐释和诠释不足而引发“思想考古”中的“科学化危机”。中国学者在“回到马克思”的思想探旅中对此进行批判革新逐步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范式, 为构建中国自主学术话语体系奠定文本底据和思想基础。无论是文本学意义上的“思想考古”, 还是出场学意义上的“思想建构”, 都是对经典文本的思想激活和意义建构。深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 需要总体把握文本阐释学的意义和限度, 以中道原则规避对经典文本的诠释过度、诠释不足和诠释中断。为此, 要聚焦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思想主题进行文本诠释, 合理把握“文本间距”的“互文诠释”和“思想转承”, 围绕特定思想坐标以贯通时空的“历史意识”激活“思想转承”中的“意义空间”, 将“意义诠释”作为“思想考古”的坐标调适和“思想创造”的视域拓展, 以方法论自觉夯实思想史研究之“当代性言说”的思想厚度和未来向度。

关键词: 马克思; 西方马克思学; 思想史研究; 历史科学; 文本阐释学; 文本间距; 思想转承; 意义空间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85(2025)03-0012-17

从思想史的视界看, 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解放的“历史科学”, 提供了观察世界变化和审思时代坐标的思想武器, 让中国人民找到安身立命、自立自强的思想指引。历史和实践证明, 正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真精神展开辩证的时代实践, 使中国改革发展实现了质性递升。掌握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 研读经典文本是不可回避的基本功。然而, 经典文献浩瀚晦涩, 这在客观上需要通过文本的深度耕犁和方法论自觉予以总体把握, 不能因为卷帙浩繁而作为“告别文本”的理由, 也不能因为“语言转译”的问题而轻视对经典著作“中译本”的系统研读和深入研究。基于“一手”文本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²)的“未完成性”, 以及不同语言的“转译障碍”^①和研究者本身的语言能力, 如何利用好现有经典文献的“中译本”展开中国马

收稿日期: 2025-02-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现代化思想演变逻辑和发展形态研究”(22BKS068)。

作者简介: 刘占虎, 男,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政治哲学、历史哲学。

^① 文化语境里知识的个体性差异以及不同文化体之间的差异构成了理解和翻译中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释义障碍。参见陈开举:《文化语境、释义障碍与阐释效度》,《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第184-203页。

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如何在以不同视界“读懂马克思”的思想进路上抵达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并以发展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来求解“时代之问”？在建构中国自主学术体系和知识体系的时代基点上，如何在贯通经典文本之思想逻辑的基础上守正拓新，以中国学术自觉增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释权和话语权？为此，以“文本间距”“思想转承”“意义空间”的结构性延展关系为分析框架，集中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进行探索性建构，彰显从“思想考古”到“思想创造”的思维自觉，以中国思想自觉助益“当代性言说”的历史主动。

一、文本阐释学在思想史研究中的意义和限度

“读懂马克思”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切入点，也是彰显其“历史科学”之时代意义的思想前提。在百余年的编译、研究进程中，形成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诸多范式。在这一进程中，如何面对经典文本及其思想逻辑，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和“当代性言说”的重大课题。如果说“理解文本和解释文本不仅是科学深为关切的事情，而且也显然属于人类的整个世界经验”^①，那么对经典文本之“传承物”的理解本身意味着见解的疏通和真理的被认识。阐释意味着重新理解，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理论创新的结果。随着哲学研究范式的语言学转向和西方阐释学（诠释学）的引入，加上中国古典意义上的考释学和西方阐释学的双重推进，中国学者开始探索并反思文本阐释学的中国逻辑。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阐释学及其“思想风险”

一切历史的精华最终表现为思想史，而哲学史是思想史的主干和灵魂。黑格尔所言“哲学史的本身就是科学的，因而本质上它就是哲学这门科学”^②，而“哲学是关于真理的客观科学，是对于真理之必然性的科学”^③，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思想家陈述其思想的文本载体的重要性。回到哲学史语境来理解哲学命题，一方面表明作为“第一哲学”之研究对象和上手进路的特殊性，即不同于一般“部门科学”的确定性论域，这是因为“哲学史由于它的题材的特殊性质，是与别种科学的历史不同的”^④——哲学探求“无”之于“有”的思想进路，通过体悟思想家记述思想的载体（存留“文本”）来走进其思想语境，从中体悟对若干经典命题的求解视域和致思进路。另一方面表明，离开“哲学史”“思想史”的语境支持和知识铺陈，直接上手去求解“古今之辨”相关的思想论题，难免会导向一种“无根化”的操作。当然，任何意义上的文本依托或底据，只是“走进思想家”的必要进路，不等于直接把握其思想本身。“读懂马克思”意味着深度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坐标和未来向度。作为思想标识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求解“历史之谜”和探索人类解放的“历史科学”，以厚重的创世文本留给后人以“常读常新”的思想范本。

在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领域，MEGA的编撰出版和系统研究孕育着一个标志性范式。经过近百年的整理和研究，相对有条件对这一范式之利弊作出研判，并通过总结既有研究经验来探索文本阐释学研究的可能进路。针对“马克思思想”研究中的教条化倾向尤其是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回溯“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⑤的进程中阐明“历史科学”的方法论特质。“西方马克思学”扬弃以往价值主导（预设）和主流话语的解读模式，开始以“科

① [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页。

②③④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2、18、14页。

⑤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8-78页。

学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信念和方法)为进路的文本耕犁和纯粹文本学意义上的“思想史考古”。这些多元化的进路和范式,以开放的姿态走进马克思的思想文本和思想坐标,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提供重要的文献学支撑。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引进和借用这些范式的同时逐步开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的探索之旅。经过多年来的“自主探索”^①和“范式转换”^②,文本阐释学研究因“诠释过度”引发的思想风险亦在不同程度凸显。

毋庸讳言,任何一种方法和进路都是治学问道的手段。其中利弊当全面观照,并择善而用之。要肯定回到经典文本来理解“思想命题”的重要性,肯定聚焦经典著作(文本)是展开思想史研究的根基。同时,应明确意识到,肯定研读经典文本的重要性,倡导文本文献研究方法,并不等同于纯粹“实证科学”意义上的文本考古。文本阐释作为走进经典和进行思想诠释的中介,重在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来诠释其思想进路和思想意旨。西方学者在“部门化”研究论题的拓展中关注资本主义的异化问题以及在“自我修复”中的新变化,只是抓住了马克思思想的问题论域和局部特征,来服务于其特定思想立场的理论建构。这一范式转向尽管与马克思早期的哲学思路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以抽象的人学叙事隐匿了“人本主义”价值立场中始终存在的“科学主义”的思想主线。文本阐释学(诠释学)研究倡导“实证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主义”原则,难免忽视经典文本内在的思想史逻辑,不利于对马克思哲学变革及其思想坐标的整体性把握。一般来说,文本诠释学尤其是“西方马克思学”倡导“部门化”研究注重“碎片化”的考证,在扬弃以往“宏大叙事”的同时讲求个别问题和部门思想的考据学逻辑,其对马克思思想的来源、内涵和逻辑变化缺乏整体性的思想把握。实际上,“历史科学”语境中的“科学”不是狭义的“实证科学”,而是之于人类“历史之谜”的规律之道。

(二) 文本阐释学在思想史研究中的意义向度

文本学亦称文献学,主要以书籍(文献)为研究对象来考察思想脉络,在中西方皆有悠久的传统。历史地看,语言、符号、文字与图像的产生,原本是为了人们交流信息和记录思想。随着积累渐多和传承交流,逐步成为特定文化和思想的载体。思想与文本的张力始终都存在,走进经典文本意味着与经典作家的“视域融合”和“思想对话”,知识铺陈和语境预设直接决定文本耕犁中的“信息读取”和“意义诠释”。经典作家在阐述其思想时有明确的思想主题和显白之义,也有特定的“思想留白”和“语义空间”。文本阐释之于思想诠释,也就存在“见仁见智”的开放性。之于经典文本的显白之义,当如何把握其内在的思想逻辑之于经典文本的隐微之义和潜在的思想要义?加之文本原始语义与文本互译(转译)中的语言差异,如何以“非失真”的方式走进经典文本,是思想史研究面对的首要课题。近代哲学转向的语言学革命,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家”抑或“语言是思想的栖息地”,正如“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观念必须先对本族语言翻译成别族语言才能流通,才能进行交流,这种场合的观念才可作较多的类比”。^③文本阐释学(诠释学)的兴起,在一定意义上达成思想与文本的中道权衡,研读者通过“释义”“发微”“探幽”来激活经典文本的思想逻辑和意义空间,让“死的文本”(作为思想载体的“传承物”)以“活的思想”(“真精神”)引领时代发展。

① 20世纪90年代以来,如《走进马克思》《走近马克思》《回到马克思》《面向马克思》《迎候马克思》《重访马克思》等“本土化”论著的问世,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的研究论域。这些代表性著作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思维创新和自觉,一是对传统教条化研究的批判,二是对“西方马克思学”的中国回应。

② 杨学功:《在范式转换的途中》,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79-10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页。

在“西学东渐”进程中，中国阐释学（诠释学）随之兴起，不仅体现在古典古文训诂的“思想史考古”上，也体现在“西学经典”的本土化诠释上。如果说思想与文本的张力是客观存在的，那么，这种张力主要源自研读者的“思维前见”和“语境预设”。现实地看，研究者基于不同的知识背景在面对同一文本时，所读取的信息以及从中获取的思想智慧是有差异的。面对经典文本和思想命题，个中的思想互动和价值抽绎是存在差异的。发展地看，思想史研究要求有一个思想增量的结构性变革过程，“理解的运动就这样不断地从整体到部分又从部分到整体。理解的任务就在于从同心圆中扩展被理解的意义统一体”^①。最大程度地避免重复研究或表层化的文本释义，是增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阐释权的基本要求。面对这一思想任务，就必须回应一系列新问题：一是“谁之解读”是最接近经典文本和思想家本意的，哪些阐释（诠释性）成果是权威性的？二是在对经典文本“千锤百炼”的研读中，如何获取体现思想增量的创见？三是在“我注六经”的“意义阐释”中产生的诸多认知分歧，如何聚焦特定“思想主题”展开共识性理解和开放性研究？四是在“六经注我”的“当代性言说”中，如何规避因缺乏前提审思和对历史发展过程之中介“环节”^②的总体把握而引发的“诠释过度”和“强制阐释”？

在一定意义上说，上述隐忧是困扰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普遍性问题。在经典阐释学（诠释学）作为一种哲学“研究对象”本身的情况下，如何审思其思想进路的意义向度，尤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中保持文本阐释的意义和限度？“常识在日常应用的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碰到极为惊人的变故。”^③文本阐释同样如此。尽管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时代，但作为“新世界观”的“历史科学”思想的存在总是取决于现实对思想的需求度及其转化度。“历史科学”以揭示“历史之谜”的规律之道“走向当代”是时代发展的吁求。面对这一根本性问题，中国思想界的时代使命，不再是重复性地制造“马克思当代化”的宏大叙事，而是“勇于重释旧经典，正视新文本，脚踏实地地返本开新，在一种新的历史视域中真正解决当代生活世界的新问题”^④。

（三）文本阐释学在思想史研究中的向度调适

阐释或诠释是“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思想转译过程。“科学，尤其是与人文价值和人文追求联系如此紧密的‘历史科学’，是必须要从实践着它的那种社会文化的与政治的整体结构之中加以考察的。”^⑤从思想史研究的“诠释向度”看，就是以新的问题线索为导引重新激活经典（文本）的思想意旨和现实观照。从文本阐释学的“意义向度”看，“死的文本”及其作为定格的思想表达在新的时空境遇中展现其“方法论意义”，需要研读者以贯通时空的思想锐力

① [德]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 I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年，第 70 页。

② 思维的真理性和现实性，是之于此岸性历史实践的总体澄明。思想把握现实的总体性，源自对社会存在之“历史发展过程和中介环节”的总体性认知。“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26 页。）“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8 页）。在卢卡奇看来，“社会的发展不断加剧局部环节与整体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因为现实的固有含义日益放射出强烈的光芒，所以过程的含义愈来愈深地埋藏在日常事件中，总体浸透在现象的时空特点中。”“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参见 [匈]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年，第 77、58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4 页。

④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 年，第 713 页。

⑤ [德] 格奥尔格·G. 伊格尔：《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年，第 23 页。

构造出合乎逻辑的意义空间,也就面临一个思想转化和诠释尺度的把握问题。

其一,规避“过度阐释”和“强制阐释”问题(“诠释过度”)。文本阐释学(诠释学)研究在一定意义上是为了规避过度的“意义赋予”,抑或规避“见仁见智”的多元化阐释对经典文本原初旨意的曲解或泛化。在构建中国阐释学(诠释学)的过程中,张江就经典阐释的前提逻辑和思想张力予以系统论述^①。其中,提出“强制阐释”是当代西方文论(文本学研究)的基本特征和根本缺陷之一。“强制阐释”是指背离文本话语,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其基本特征有四:一是场外征用。二是主观预设。三是非逻辑证明。四是混乱的认识路径。^②其理论缺陷具体表现为实践与理论的颠倒、具体与抽象的错位以及局部与全局的分裂。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文本学”研究中,同样存在“过度阐释”和“强制阐释”的问题,如一些西方学者将人类社会运动结构之市民社会因素阐释为“经济决定论”或“唯生产力论”,将阶级斗争阐释为“政治斗争论”“激进革命论”等。

其二,规避“文本嫁接”^③和“断章取义”问题(“诠释不足”)。与“过度阐释”和“强制阐释”相对的另一个极端则是“文本嫁接”和“断章取义”。经典(思想)通常是以相关“文本群”来呈现的,即使作为单个的经典文本也有特定的思想史坐标。理解某一文本的思想逻辑,既要聚焦文本陈述,也需要从思想史的“转承逻辑”来考察文本的思想坐标。之所以出现“文本嫁接”和“断章取义”问题,抛开主观上恶意歪曲的因素,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经典文本的人为疏离或耕犁不足,二是特定的立场偏好和“思维前见”。思想史研究需要冷静而审慎的方法进路。治学必当出力,坐冷板凳是经典文本深度耕犁及基础理论研究的基本功。文献积累功底不够或文本耕犁不到位,难免导致理解上的偏差抑或断章取义,诚如“人们在理解之中看到了真正的东西,在符号之中看到了附带的东西”^④。聚焦某经典文本的言说重点,忽视与其他“文本群”的“思想勾连”而试图径直提炼出其主题和要旨,会导致非主观意义上的“断章取义”。同样,在远距离的“文本群”的“思想勾连”中,由于对思想家“问题域”之特定思想主题把握不够,会导向遮蔽思想主旨的“文本嫁接”和阻隔意义空间的“思想拼图”。

其三,规避“思想考古”中的“意义断裂”问题(“诠释中断”)。基于如上存在的“强制阐释”和“断章取义”的问题,在思想史研究中启用另一古老的研究范式,即“思想考古”或“思想史考古”。“思想考古”是之于考古学范式的文本学应用,即以现存的或实存的文本文献(“传承物”)为根据,通过对文本显露的思想片段的“再加工”,以呈现特定思想的内在逻辑和意义指向。这一研究范式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本学为代表,讲求回到文本本身的思想信息的“本真性读取”。文本片段显现多少思想信息,就客观地去读取多少。基于文本片段或碎片化文献的“思想考古”,尽管被看作研究领域的细化或部门化深入,但存在对文本片段及其思想总体

^① 2012年以来,张江对当代西方文论存在的问题和局限进行辨析,并系统阐述“强制阐释论”的理论观点。参见《强制阐释争鸣集(六卷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争鸣集”收录中外学者围绕“强制阐释论”的学术论文200余篇,既有各自的阐发和论证,又有相互之间的对话和勾连,共同构成这一“理论事件”的思想图景。

^② 参见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第7-20页。

^③ “嫁接”原为植物学术语,其原理是利用植物自身的愈伤机能和亲和力。在此作为引申义的“文本嫁接”,主要意指在文本诠释中之于主观向度的意义重构与文本作为思想有机整体之“亲和力”的错位。诠释者基于特定的问题意识和“思维前见”对文本词句的“机械化组合”,由于缺乏对文本语境和思想逻辑的总体性把握,引发对文本思想的肢解和曲解。作为否定意义上的“文本嫁接”是“断章取义”的另一表达,抑或说,正是由于“文本嫁接”的“非有机性”(思想逻辑的“亲和力”缺损)导致“断章取义”。

^④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语法》,韩林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页。

性的遮蔽。这一研究范式在阐述片段性思想信息上注重客观性，有益于规避“强制阐释”和“断章取义”的问题。然而，思想家本身是现实的人，其思想表达和文本呈现客观上有一个走向成熟的过程，我们无法要求一个思想家必须在一个文本中简明扼要地阐述其成熟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中，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所说的青年马克思（“人本主义”）与老年马克思（“科学主义”）的割裂，尽管有文本片段上的“思想依据”，但总体来看并不符合马克思本人思想的生成逻辑，由此，其以“我注六经”的方式创造“两个马克思”的“对立说”以及马克思思想的“断裂说”。按阿尔都塞的诠释逻辑，思想家在不同时期的思想重心可能存在差异甚至出现“相反”的论见，不同的思想家基于同一思想主题的拓展必然存在“思想逻辑”上的差异。特雷尔·卡弗（Terrell Carve）对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关系”的考察以及由此引发的“思想事件”^①，迫使后来的研究者对这一常规命题的再研究，如提出“共同创立说”“继承发展说”“差异互补说”等来加以补救。

由此可见，方法论自觉是学术研究真正进入科学层面的重要标志。“回到马克思”^②是借鉴MEGA²编撰及其研究成果基础上的范式拓新，但没有严格遵循国外“马克思学”的“科学主义”进路。基于几十年的文本耕犁和思想史研究，中国思想界有资格对文本学研究的学术史意义和潜在局限做出审慎研判。在西学东渐、外文互译、文本耕犁方面的厚重积淀，使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有良好的文本基础展开创造性的文本学研究。在此基础上，“利用MEGA²的最新文献成果，服务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增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释权和话语权”^③，从而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成为时代赋予中国学人的历史使命。换言之，在尊重经典文本的基础上守正拓新，以中国学术自觉增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释权和话语权。为此，以“文本间距”“思想转承”“意义空间”的结构性延展关系为分析框架展开具体论述。

二、围绕思想论域把握“思想诠释”中的“文本间距”

思想总是通过特定的中介和载体来说，文本是记录思想的重要载体。思想的灵动性与文本

① “思想事件”是标志性思想命题的提出以及对人类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课题。在中性意义上看，“思想事件”作为开放性的思想论题，为人们致思特定论题提供共识性的“对象域”。在肯定性上是对特定思想命题的意义认定和价值认同。如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表明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规律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被揭示出来。在否定性上是指对重大思想命题的质疑或重释而引发人们的重新审视和意义澄明。

② “回到马克思”是直面“马克思思想何以出场”和“马克思如何走向当代”的“归基”工程。依提出者所见，这一范式的“出发点”不是企图寻求和凝固化一种原教旨主义式的本真教义，而是致力于开拓一个开放文本的崭新视野，从中破解对经典文本解读之“千锤百炼”但又存在“步履蹒跚”的尴尬困境。“回到马克思”的方法论自觉意味着跳出“就哲学论哲学”的解读范式，着重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深层语境中重新探索其哲学话语的转换，将经济学与哲学结合起来整体考察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全程。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2009年（第二版），2014年（第三版），2020年（第四版）。该著日文版、英文版、俄文版、阿拉伯文版、韩文版渐次在海外推出，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原创学术的思想力量和世界影响力。该著作者在“第四版序言”中指出，基于这一著作是“历史的”思想成果，除增加个别文献和附录中MEGA的出版情况外不再对全书进行全面修订。2024年，《回到马克思：社会场境论中的市民社会与劳动异化批判》问世，是继《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以来的第二部“回到马克思”之作。比较来看，“第一卷”是对马克思哲学与经济学探索的文本学剖析，“第二卷”就是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专题性深入，这是马克思面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分析过程。相对于哲学方法论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学的剩余价值理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是马克思在社会主义实践与理论探索中已经实现却隐而不张的“第三个伟大发现”。关于两次“回到马克思”的思想进路差异，参见张一兵、孔伟宇：《市民社会与劳动异化：重新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第二卷出版之际（访谈）》，《学术界》2024年第7期，第15-25页。

③ 张一兵、孔伟宇：《MEGA²研究前沿与马克思思想史研究》，《国外理论动态》2022年第3期，第3-12页。

的既成性始终存有一定的张力。现实地看,某一思想走向成熟有一个历时性的建构过程,思想家在关注时代课题的语境差异和视域焦点总会体现在特定文本的书写上。“思想对话”是思想形成和文明塑造的出场方式,哲学批判构成哲学创造和思想创造的内在支撑。基于实证科学的“科学主义”原则的文本学研究,不能将特定的“文本断裂”直接视为思想家的“思想断裂”或“思想矛盾”。尊重经典文本的思想逻辑是对马克思思想事业的敬重,是对马克思“历史科学”之“当代性言说”的审慎。围绕马克思的思想论域和经典文本来“读懂马克思”,需要坚持广泛研读、深度耕犁与结构性批判,力争使经典阐释和思想创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一) 整体把握文本的“思想线索”

每个文本都有其特定的思想主题,思想家的特定思想意旨是通过不同的“问题域”及其相关文本来呈现的。马克思的思想文本主要有成熟性的系统论著、不同时期的笔记、专题性的手稿。第一类是已经完成的思想的形式化表述的文本,如《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等,是理解马克思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主导性文献。第二类是马克思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的各类笔记,如《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伦敦笔记》等,是了解马克思各类思想原发因素的重要文本。第三类是不同时期的手稿和各类学术性书信,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与恩格斯、费尔巴哈、卢格、安年柯夫的通信等。这些“拟文本”由于具有未经修饰的本真语境,更有助于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在不同的思想文本中揭示思想家的思想发展逻辑,需要在文本深度耕犁基础上展开合乎逻辑的思想诠释。

研究部门性文本是把握宏观思想主旨的具体化进路,但离不开对“思想主题”和“思想线索”的总体性把握。从马克思的思想主线来看,主要是创立“新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不同的思想文本都在言说这一“历史科学”的缘起、展开、完善等。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①这里的“正统”,就是指“方法”之于“思想主题”和“思想线索”的一种科学的信念。理解《资本论》的要旨,同样需要这一“新世界观”的思想支援。《资本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之方法论的具体化呈现,只有从非正义的社会结构中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才能在人类社会矛盾运动的有机性上阐明人类社会形态的变革逻辑,进而阐明人类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历史底据。对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学理性阐释和现实性确证,构成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意义指向,也就从中阐明“实现人类解放”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哲学革命和实践变革。

(二) 兼顾近距离文本的“互文诠释”

思想家在言说特定“思想命题”时总会以论述素材的丰富性来展现“论”的厚度,敞显历史与逻辑的具体统一性。重大“思想命题”总是基于特定语境(问题域)和前提(知识论)的逻辑判定,其中的语境重在表达一种确定意义的限度、范围和条件。在常规的思想史研究中,主要是通过文本底据来寻找体现主旨意向的“关键句”,从而使这类句式为“佐证类论述”提供直接有效的观点支撑。经典作家的思想表达总是基于特定的言说对象和历史语境,文本学研究也就需要结合上下文进行“互文式”诠释,进而周全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逻辑和言说重心。如马克

^①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9页。

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①这一看似平常化的文本表述，却蕴含特定的思想寓意和思想主旨。如果说“两个必然”蕴含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科学”之研究方法的“思想预言的结构”^②，并贯穿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文本群”的论述中，那么，直接从“时间范畴”的意义上理解“过去”与“现在”的支配逻辑，以及从“过去”到“现在”的逻辑转承，显然是不够的。具体来说，一是忽视或遮蔽两种制度形态（社会形态）在历史性变革中的逻辑重心，即弱化或消解“两个支配”的制度逻辑和转换机理。二是忽视或遮蔽文本间距在“思想转承”中的语义留白，为理解其他“文本群”的思想构境添设了盲区。这就需要进一步阐明：什么样的“过去”和什么样的“现在”，以及二者之间潜在什么样的“支配”逻辑。

面对这一理解上的困惑，可以在《共产党宣言》近间距文本的“上一段”中得到有力的印证，即“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③。由此佐证，在制度逻辑的历史性变革上，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者（雇佣工人）从作为“过去”之“物役化”的手段，历史性地变革为“现在”之人本化（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手段。由此表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性，即不是一般地“消灭私有制”，而是通过扬弃（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来“否弃”社会化大生产中导致“物役性劳动”的生产关系建制。经由对这一“支配”逻辑的历史性“倒置”，使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物的丰富”真正成为支撑“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由此，蕴含在“支配”逻辑中的“手段”的“变革”，也就成为从历史过程视野理解“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原理的重要中介。

（三）兼顾远距离文本的“互文观照”

每个文本都有既定的思想主题，一个核心思想会以不同的维度体现在异质性的“文本群”中。阐释文本中的某一表述，不仅需要近距离的“文本互构”，也需要在总体把握基础上的“文本勾连”。文本耕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呈现为“总体观照”与“深入体察”的辩证进路，“犹如我们首先要对于一个地方的风景加以概观，如果我们只流连于这风景的个别地方，我们就会看不到它的全景。事实上个别部分之所以有其优良的价值，即由于它们对全体的关系”。^④

具体来说，其一，以思想主题为坐标展开对经典性论著的语义补白。《共产党宣言》有诸多经典性表述，“两个必然”是历史唯物主义特有的“思想预言的结构”，并贯彻于其他文本的逻辑阐述中。这就需要以贯通“两个必然”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之“两个决不会”的思想逻辑为坐标，具体分析其他文本中观点性论述上的“语义留白”。其二，兼顾同期笔记和手稿等对常规性文本的溯源性线索。笔记和手稿作为马克思思想原发因素的重要文本，从中可以“找到马克思各种思想最初形成的理论激活点和溯源性线索”^⑤。如，1844年的《巴黎笔记》有助于理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本真语境；1845年的《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有助于读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本质；1850—1853年的《伦敦笔记》对于发掘《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蕴藏的内在哲学逻辑具有

①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页。

②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47页。

④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1页。

⑤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4页。

直接的思想支撑。其三,整体观照马克思主义“子系统”的边界和思想主线。经典文本和手稿的分散性,并不损害其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和有机性。尽管说“百科全书的时代已经过去,每个科目都顺从于自己的界限”,“越来越细的科目划分使历史的统一性趋于丧失”,^①但历史作为“整体性”不会因为研究视域的切割而丧失。对马克思主义三个“有机部分”的常规诠释中,尽管突出马克思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论域界标,但难免损失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批判和哲学革命,离不开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奠基工程”。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需要马克思哲学(“新世界观”)作为思想坐标的总体性统摄。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同样需要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实逻辑之前提支撑。

近距离文本的“互文诠释”和远距离文本的“互文观照”,是围绕特定思想论域进行“思想诠释”的有效方式。通过比较研究和拓展性分析,使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言说”不降低其思想水准。现实地看,研究者以有限的时间和精力读懂马克思的全部著作无疑是具有挑战性的,除上文述及的“三类文本”外,需要进一步关注马克思在论述中涉及的诸多思想人物和批判对象。这些思想人物和批判对象的代表性论著是读懂马克思著作的思想背景和重要支撑。2021年,商务印书馆推出的“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经典著作译丛”(全45种55册)为理解马克思著作之“远距离”的文本提供了可靠的知识支撑和思想支援。此外,由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Wolfgang Fritz Haug)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涵盖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核心概念,对于理解思想史上“重要范畴”的使用语境和“语言转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四) 把握“文本间距”的诠释尺度

研读马克思的不同类型的论著(文本),需要观照相关“文本群”,尤其是一些有特定思想价值的“拟文本”。这些文献能够直接提供理解经典论述的思想支持和背景支援,有助于了解马克思创作的具体语境、历史背景及思想困惑。紧扣相关“文本群”展开的文本学研究,需要总体性的思想坐标,即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科学”。如果说基于同一文本的上下文“互文观照”是近距离“文本互构”,那么,在上述“三类文本”之间的“互文观照”是远距离“文本勾连”。“文本勾连”是以主题贯通和思想转承为前提的,离开马克思的思想坐标,以按图索骥的方式进行“拼图”,无疑会损伤马克思哲学的文本逻辑和生成语境。文本考据和“思想史考古”固然注重所存文本的真实性,但由“拼图”构成的“新文本结构”则不是马克思的思想标本。进言之,基于“拼图”叙事来直接进行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言说”,往往不是对马克思的思想再现。离开经典文本的思想支撑,所谓的“在马克思看来”“马克思指出”“马克思认为”等,也就沦为借“马克思”的合法性来言说自己理解中的“马克思”。

于此而言,走进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是为了科学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和哲学视野。要聚焦“思想坐标”来把握“文本间距”的诠释尺度,思考“诠”与“释”如何在思想史意义上达成统一,“他境”与“我境”如何实现“当代人”意义上的“视域融合”,“本旨”与“价值”如何实现合乎历史逻辑的思想抒发。一言以蔽之,避免“强制阐释”,需要阐释者自觉把握“文本间距”的合理尺度,做到“补位”不“越位”,“到位”不“缺位”。这一方法论原则“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往往是另一回事。与其出于“悲观论”的消极逃避,不如确立“思想在路上”的积极态度,通过反复性阅读和结构性研读来走进历史的深处。文本是僵死的,但思

^① [法]雷蒙·阿隆:《历史意识的维度》,董子云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页。

想在场。历史是过往的，但意义指向未来。历史学记载的“事实”未必是实存的现实，文本记载的“事实”未必是实存的历史。基于历史逻辑的分析，需要对“历史事件”的意义空间作出契合历史语境的思想把握，“只有把它们置于具体的、有时模糊的，但一直不断的、丰富的、丰满的‘实际生活’——主体间的、可直接认知的经验连续体——的基本结构中才行”^①。

三、聚焦思想主题考量“文本间距”中的“思想转承”

深化对经典文本和思想史研究，是对马克思思想事业的学术继承，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时代及其变革逻辑的思想澄明。经典文本在后世的阐释和诠释中，总是被赋予开放性的意义空间。对经典文本的深度耕犁和中道诠释，既要围绕特定思想论域把握“思想诠释”中的“文本间距”，也要聚焦思想主题考量“文本间距”中的“思想转承”，从而确保“走进经典”激活“文本思想”的本真寓意，通过“读懂马克思”展开合乎思想逻辑的“当代性言说”。

（一）文本阐释与思想史研究的内在支撑

“读懂马克思”，需要理解马克思“历史科学”的内在规定，回到承载其思想生成的文本结构和历史语境。文本阐释是思想史研究的内在要求和基本环节，也是总体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和思想出场的重要依托。纵观思想史研究的常规范式，总是以“经典文本”为“传承物”，以“基本原理”为方法坐标，展开“思想逻辑”与“时代意蕴”的时空对话和意义勾连。

其一，“思想主题+经典文本”，探寻“思想史支撑”的文本逻辑。任何经典文本都有特定的思想主题。这种主题源自思想家的思考语境、思想立场、问题意识。聚焦思想主题与文本耕犁是一个双向建构过程。一是作为“思想史”的比较研究。基于特定经典文本在思想史上的坐标，以预设性的主题统摄来切入文本，由此印证文本逻辑与思想主题的契合度。在此基础上，比较基于同一“问题域”中相关思想家的思想差异抑或某一思想家对同时代共同课题的求解之历史意识的差异。二是作为“文本群”的比较研究。文本是表达思想的符号化载体，也是进行文本阐释和“思想考古”的依托。现实地看，思想家的文本书写往往不是聚焦和完整的，而是基于诸多文本共同构成由特定思想主题贯通起来的“文本群”。作为单一的文本有其特定的形成语境和思想侧重点，那么，不同的思想面向在多大程度上统一于思想家的思想意旨呢？这就需要回到思想史及其“文本群”中，通过比较来确定次级化的思想课题与作为“元思想命题”的逻辑结构，进而阐明思想家的思想历程及其思想建构过程。

其二，“经典文本+时代命题”，建构“文本性支撑”的经典逻辑。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的灵魂，观照时代的先声。“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②在思想史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主要呈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对重大“思想事件”的历时性求解，二是对若干“时代命题”的思想史观照。“思想命题”源于“思想事件”并拓展“思想事件”的意义空间。“思想命题”因“时代命题”赋予新的活力，并回应超越时空的“思想事件”。就前者而言，之所以能成为“思想事件”，就在于对人类长期困扰的思想难题的集中表达。这样的“思想命题”往往具有超时空性，如“苏格拉底之死”“卢梭命题”“休谟命题”“柯尔施命题”“忠恕命题”等，是不同时代的思想者走进思想深处绕不过的

^① [英]以赛亚·伯林：《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潘荣荣、林茂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9页。

^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页。

思想课题。就后者而言,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时代之问”,作为历史发展逻辑在特定时空的问题表征,构成思想研究的问题缘起和立意基点。常规意义上的研究进路,主要是以“时代命题”为线索,通过诉诸经典文本的思想坐标来求解时代课题。

其三,“基本原理+时代命题”,建构“原理性支撑”的坐标逻辑。基本原理是对客观世界运动规律的揭示,是对若干思想命题理论化系统化的呈现。“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① 马克思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创立人类解放的“历史科学”尤其是关于资本时代的“历史解剖学”,至今都是人类思想精华的良心。人类依然生活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扎根历史并朝向未来的。破解全球化时代人类生存困境和发展难题,客观上绕不开马克思的思想坐标和求解“历史之谜”的“历史科学”。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时代课题和“思想命题”,是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内在要求。

其四,“基本精神+时代精神”,建构“时代化创新”的思想逻辑。哲学是时代精神上的精华,是由时代精神不断予以填充和浇灌的思想结晶。“如果哲学有一个历史,而且这历史只是一系列过去了的知识形态的陈述,那么在这历史里就不能够发现真理,因为真理并不是消逝了的东西。”^② 回到文本意味着回到思想史和哲学史,但不等于简单地重温文本所记载的知识形态,而是通过文本逻辑的深度耕犁来揭示思想的真理。回到经典文本且不拘泥于经典作家的本本和教条,重在以现实性思维抵达马克思哲学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内在逻辑,提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思想课题和思想方案。“回到马克思”的思想叙事“不是抽空自己,返回到纯粹的、未受任何认识‘污染’的马克思那里去,而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的话语和思想,回应当今世界中引发我们兴趣的、有待解决的问题,从而阐明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③。面对马克思尚未直接遇到的新课题,需要以发展的“历史科学”作出新的解答。如信息时代和数字时代的人类生存境遇、资本逻辑的深层钳制、智能时代的人文危机等。这些问题域既超出马克思的“最初语境”,但又置于马克思的思想坐标中。求解高度复杂性的时代课题,需要在“新世界观”的指引下创新理论研究的思维视界,以开放性思维会通其他思想资源并作出总体性的思想解答。

(二) 总体考量思想出场中的“思想转承”

文本不是孤立的素材或思想的碎片,而是潜藏特定的思想主线和目的意向。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文本,需要追溯在一定历史时期影响其思想的深层理论构架。思想作为对真理(规律)的揭示,意味着对事物内在的必然联系的把握。“从文本解释学的语境上看,任何文献都不具有直接现成的可读性。只有在充分彰显作者创作文本的原初背景视域后,历史的解读语境才可能真实呈现出来,也才具备读者解读视域与之整合的前提。”^④ 针对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马克思没有拘泥于道德叙事或形而上学的分析,而是通过“思想变革”的哲学革命,深入到市民社会的内在结构和运行机理,从中揭示“资本逻辑”的生发境遇、内在矛盾、演变形态。《共产党宣言》揭示的“两个必然”原理,并没有作为宣告式的“结论”而终止,而是将这一蕴含特定的“思想预言的结构”贯通到所有的文本阐述中。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页。

②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4页。

③ 俞吾金:《被遮蔽的马克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1页。

④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5页。

马克思有其特定的思想地平，理解马克思的思想需要一种思维格局和历史情怀。离开对思想家心路历程的变化和“思想转承”的历史性把握，就容易在差异性的文本分析中生发非文本逻辑的误读或误认。其中，代表性的是“断裂说”和“对立说”。一是阿尔都塞的“断裂说”。在阿尔都塞看来，异化是人本学的深思，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是真实的科学，本质上是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只是对他青年时代（1840—1845）的理论基础——人的哲学——作了彻底的批判后，才达到了科学的历史理论。”^①由此得出青年马克思哲学发展中经过了从“人本主义意识形态问题系”向“历史唯物主义科学问题系”的结构性断裂。人本主义作为一种价值坐标，是思想建构的出发点。抽象的人本主义叙事是脱离历史存在的形而上学。正如“占星术和天文学长期以来相互并存，而且科学天文学没有完全消灭占星术”^②，亦如“牛顿的发现并没有改变开普勒和伽利略物理学的基础”^③，人本主义立场和科学主义分析可以并存于马克思思想建构的全程。二是特雷尔·卡弗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学说关系的“对立说”。特雷尔·卡弗认为，恩格斯作为“体系化的哲学家，他将马克思的著作置于一种哲学的和学术的语境，衍生出普适方法论的哲学意蕴”，故而“有将马克思的著作退回到传统哲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的学术范式的趋势”^④。总而言之，经典作家基于特定思想课题和时代问题的主旨陈述，不等于其自身的思想矛盾。如果对马克思哲学革命之思想脉络缺乏科学的全面的把握，那么就很难实现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言说”。

四、立足思想坐标激活“思想转承”中的“意义空间”

思想家的思想历程是复杂的，意味着不能同质性地看待其所有文本。任何文本的生成都与作者的文化背景、时代境遇等密切相关。思想家认知逻辑的变化往往随着“问题域”的动态语境而变化。这种变化在此视为思想形成和创造中的“思想转承”。“文本的形成过程不是一个静止的或线性的思维平铺，也不是一个毫无异质性的自我‘独白’，而是作者在与他同时代的人的思想交锋和碰撞中陆续形成的。”^⑤如同“世界观”在思维视界上决定“认知世界”的面相一样，以不同的话语和阅读方式面对同一文本，其认知结论和解读结果可能是异质性的。

（一）以“文本叙事”的思想坐标把握“思想转承”

视界意味着语境预设和思想诠释的切入方式。“视界在理解中变化着，这不仅是指我们自己的视界总是在理解中转化为新的视界，同样地，历史视界也不会由于我们的某一次理解而被固定，它必将随同我们视界的变化而变化，在新的理解过程中被重新理解。”^⑥哲学作为“思在”和“在思”的探索之旅，不同于一般“实证科学”的确定性，无法一劳永逸地获得终极圆满的答案。然而，“哲学参与对科学知识的批评，它的视角并非截然不同于科学，而是采用了一个较少关心细节却更加注意组成各学科整体和谐的视角”。^⑦文本有特定的思想主题，对经典文本的

① [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18页。

② [法]雷蒙·阿隆：《历史意识的维度》，董子云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88页。

③ [英]以赛亚·伯林：《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潘荣荣、林茂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89页。

④ [美]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姜海波、王贵贤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5页。

⑤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716页。

⑥ 潘德荣：《西方诠释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页。

⑦ [英]伯特兰·罗素：《哲学大纲》，黄翔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页。

开放性研究是跳出话语“独断性”和“同质化”的客观要求。然而,脱离思想主题和整体视角走进马克思文本中的“众说纷纭”,却不是“开放性研究”的题中之意。

历史唯物主义之“新世界观”的确立不是即刻性的“绽出”,而是历时性的思想变革过程。批判他者与自我批判是蕴含在这一过程中的隐性逻辑。在文本表层语句背后蕴藏着更深一层的思想寓意,即“话语的隐性逻辑”抑或“语义留白”。文本对“阅读者”不做预先的设定,但“阅读者”走进文本总有特定的前见。“走进马克思”不是无主体和无立场的操作,而是作为思想的“共情者”历史性地走进马克思的思想坐标。这种“共情”表达的是一种基于特定知识背景的“知识支援”和“思想对话”,意味着需要研究者善于从显性的文本表述中读出隐性的思想逻辑。“文本所蕴涵的思想不是在其字里行间的显性逻辑中呈线性自行布展开来的,它需要阅读主体通过自身的解读来历史性地获得。”^①如果离开特定的思想语境和脱离文本深度研读基础上的“视域融合”,那么,这种脱离原初语境的“佐证性引用”与马克思的思想意指背道而驰。立足思想坐标来激活经典文本的“意义空间”,需要以“思想转承”的历史辩证法来观照不同文本的思想主题和言说重心,以“历史性融合”来体现思想水准的“历史阐释效果”。

(二) 以“思想诠释”的历史逻辑拓展“意义空间”

阐释或诠释意味着重新理解,承载思想的文本需要得到历时性的“思想语境”,从中获取认识世界规律的“历史意识”。文本是对思想现实的把握,“若想理解关于某个文本历史上曾有过的用途和阐释,就必须确定上述物质形式所产生的意义效应”。^②文本是记述性的,而思想是灵动的历史意识。文本的意义生产不仅是一种语言活动,也是一种反思存在及周遭世界的思想表达。适如“词语的目的是要为思想给出公共性,就像言说物理对象时所具有的公共性那样”^③,不管是“回到马克思”的原初思想语境来“理解马克思”,还是通过“视域融合”进行马克思思想的“当代言说”,都需要以“历史现象学”的思想坐标激活马克思在“思想转承”中的“意义空间”。“所谓走进马克思,重要的不是要走进马克思根据 19 世纪西欧社会发展的历史情境作出的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特征描述和理论结论,而是深刻把握马克思开展历史研究的广阔视野和辩证分析的方法。”^④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走进马克思”是为了“读懂马克思”,更好地掌握“历史科学”的科学思维和实践智慧。对马克思“新世界观”的“意义空间”之拓展性把握,需要在方法论上重新确立非二元化的“结构性升级”的阐释框架。

文本是历史性的记述,思想是历史性的在场。历史学聚焦历史事件和历史事实,但更突出基于“现实感”的“意义链”的思想构境。历史不是对过去“故事”的简单复述,而是对“历史事件”所承载的“意义世界”的当代性言说。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科学”,旨在通过揭示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阐明人类文明的递升进路,使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走进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意味着既要走进“历史”的深处,也要从历史必然性中开启人类文明的未来。“历史科学”的思想坐标构成马克思文本叙述的思想逻辑,同样也是诠释马克思文本的思想坐标。“历史科学”作为对“历史之谜”的解答,必然需要关注历史叙事的事实逻辑。思想观念规定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上限,思想史研究既应体现厚重的历史感,也应彰显强烈的现代感。如果

①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 年,第 715 页。

② [法]罗杰·夏蒂埃:《书籍的秩序》,吴泓缈、张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年,第 2 页。

③ [英]伯特兰·罗素:《哲学大纲》,黄翔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年,第 11 页。

④ 孙伯鍤、张一兵主编:《走进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 年,第 61 页。

说“历史学家们的任务是告诉我们世界上真的发生过什么，他们因此最终避开了死板的理论模式，因为有时为了适应这些框框，不得不对事实进行削足适履的加工”^①，那么，思想家的任务是基于对“历史存在”的反思，从而为人类何以诗意存在提供合法性论证。

（三）以“中道诠释”的方法向度支撑“意义建构”

文本阐释（诠释）不是无主体无立场的操作。“为了获得知识，我们首先必须使自己不受知识的束缚，在我们使论题明确化并具有条理以前，我们必须大致地把握论题。”^② 哲学之不幸是知识倾向于细节，对阐释（诠释）来说则是偏离于论题。中道是规避“诠释不足”和“过度诠释”的方法据点，是对知识固定化和教条化倾向的摒弃。思想史研究需要在吸纳进步因素的基础上融合理论内部各个方向和各个层面，建构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理论。张一兵在《文本解读与哲学创造》的“学术访谈”中指出：“在《回到马克思》这本看起来是解读马克思的著作中，已经包含了我自己的理解和学术含量。解释学的一个合法的方法就是两种视域的融合，一方面是对原意的理解，另一方面是把它读出来的过程中也增加了新的视野。这也是马克思的思想重新走向当代的一条现实之路。”^③ 文本阐释（诠释）的中道原则，不是径直以历史记载的文本为“事实”，而是从“历史事件”的“意义链”中抽绎出“历史之道”^④。可以说，根植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历史之道”，正是孕育着人类解放事业的“未来学”革命。

真正的哲学在于深刻的时代关怀，每一时代都有其特定的思想论域。时代发展尽管脱离了马克思的“最初语境”，但并没有跳出马克思的思想论域和思想主题。文本阐释的坐标调适在于对思想主题的恪守，思想主题的确证在于根植历史逻辑的“历史之道”。这一意义上的“中道诠释”，主要体现为研读者之于时代命题和思想课题的“历史意识”。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要以“历史科学”的思想坐标进行“意义空间”的中道诠释。一是面对马克思的著作和文本时，要以“主题”看“主旨”，从“文本”看“逻辑”，依“措辞”看“旨趣”，最大限度理解其中的“思想转承”和隐微之义。二是面对经典诠释中的认知分歧，要以特定“历史境遇”为背景支援，整体把握经典命题的思想意旨和语境差异，在“存异”中求同，在“求同”中存疑，在“主旨”上共识。三是在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言说”中，要以“思想主题”关注“文本间距”，在“共情”中致思，在“叙事”中达义，在“勾连”中明理。这一意义上的“思想诠释”，是对经典诠释之“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二元结构的方法论升级，在“我注+主题+注我”的环节补充上明确“主题”的主客体维度，即基于历史感的“文本主题”和基于现实感的“思想主题”，并以“走进者”的“历史意识”作为中枢坐标。由此，作为中介环节要素的方法延伸，即可表达为“我注+ {（文本主题）+〔历史意识〕+（思想主题）} +注我”。有了主体意识的中立性切入、同理心对话、超越性互构，跨越时空的“思想对话”就有对应高度的“视域融合”，相应地，“当代性言说”也就有“历史意识”的思想厚度和思想质感。

历史是人类社会的历史，人是历史学的唯一对象，“唯有绽出的人才是历史性的人”^⑤。如果说“历史学是关于人的科学”，那么，历史学作为“关于人类社会的持续变化的科学，是要按照

① [英]以赛亚·伯林：《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潘荣荣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3页。

② [英]怀海特：《思维方式》，刘放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9页。

③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735页。

④ 赵汀阳：《历史之道：意义链和问题链》，《哲学研究》2019年第1期，第116-125页。

⑤ [德]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22页。

物质、政治、道德、宗教、知识存在的一些新条件,进行持续和必要的调整的科学”^①。“历史意识”共在于思想和行动之中。历史学之于“历史事件”的客观分析,尽管需要“无立场”的“历史意识”,这种视界并不是“没有立场”,而是指不提前“宣告答案”和“预设结论”的历史性论证。换言之,“历史学家不是通过自身的去人格化,而是让自己的个性服从于严谨的批判和谨慎的论证,从而保证研究的科学”。^②走进经典文本意味着走进“思想世界”的历史,因为“历史永远为生活服务,为之提供典范,评判过去,或者将当前时刻在过去的历程之中定位。历史所表达的是当下与过去之间的对话,而在这对话中,当下享有主动”^③。这一意义上的“历史意识”是通过历史地“走进历史”来进行“当代性言说”的历史主动。

五、从“思想考古”到“创造思想”的方法论自觉

“理解马克思”和“读懂马克思”,需要有足够的知识准备和语境支援,必须认真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界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涌现出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逐步形成具有中国本土话语的研究范式。质言之,方法论自觉是学术真正进入科学层面的重要标志,是“历史意识”之于思想自觉的重要表征。时代的发展呼吁“中国思想”的出场,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创新成为时代赋予中国思想界的重要课题。

(一)“思想考古”的坐标调适:从“科学主义”到“历史科学”的全景视域

深邃而彻底的思想是穿越时空的,是谓“历史意识”和思想力量的在场。马克思主义是迄今对人类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思想体系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图谱。时代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使人们越发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性的大学问。“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④发轫于西方的文本阐释或“思想考古”崇尚“科学主义”原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或“新世界观”意义上的“科学”,其中的立场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中立”。“科学主义”对于破除以往“一元论”范式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但其本身不是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应有之义。

马克思创立“人类解放学”的出发点,从来不是恪守所谓的“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而是以鲜明的思想立场作为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解放的“历史科学”。这种鲜明的思想立场和实践定位,不是单纯的“世界主义”或神学意义上的“普世主义”,而是基于特定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性批判的“人类解放叙事”。学术立场与政治立场尽管有别,但“价值中立”原则有意无意地表现为“去意识形态化”。在人类由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民族国家的发展竞争和利益冲突,必然以社会存在的方式反映在特定的社会意识中,尤其是特定的知识体系和学说体系中。这些“前理解或前见”是中西方思想互通和文化互鉴的思维隔阂。

抛开思想学术性的立场来看,文本学研究重在阐明是在什么意义上聚焦马克思的思想坐标,并在什么意义上拓展了马克思的思想事业。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去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学”,实质上是一种隐性的意识形态,其意义指向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意”背道而驰。纵

① [法]吕西安·费弗尔:《为历史而战》,高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2年,第33-34页。

②③ [法]雷蒙·阿隆:《历史意识的维度》,董子云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7、7页。

④ 《习近平书信选集》(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174页。

观西方“马克思学”的基本进路，其理论阐释主要服务于西方主流理论的研究，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被“降格”为其社会批判理论建构的“手段”，在开显本意中遮蔽了特有的思想高地和意义空间。基于对马克思个别文本的“去语境化”和“去主题化”的细微研究中，人为“降低”马克思的思想高度，同时也“拉低”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中的地位。在不少西方“解构主义”的研究范式中，不难发现一些“自诩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中，往往在“问题域”和议题设置上“肢解”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尤其是作为马克思思想精华的“历史唯物主义”。由于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把握以及对马克思思想发展史梳理不足，在旨意上脱离“历史唯物主义”甚至“否定”其合法性，为此，文本阐释学必须重新审思“思想考古”的意义坐标，在方法论上将“科学主义”拓展为“历史科学”的全景视域。

（二）“思想创造”的视域拓展：从“文本诠释”到“思想意旨”的总体澄明

哲学是“思想”的反思方式，是创造“思想”的原发地。哲学的重大发展在于方法论的变革。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正是“从方法以及方法与它的对象的关系中抽出理论的实际本质”，使“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①从而以求解“历史之谜”的“历史科学”科学地“解释世界”和积极地“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既具有“返本”意义上的复原或重新理解，也具有“开新”意义上的“当代性言说”和再创造。“哲学的历史所昭示的，既不是毫无增加的简单内容的停滞不前，也不只是新的珍宝平静地增加到已有的基础上面的过程。”^②马克思的思想遗产是丰厚的，尽管他曾诙谐地说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③，但其本意不在于此。马克思之后的各种次生形态的“思想流派”，从不同维度拓展了马克思的思想事业，也在不同程度地误解或歪曲马克思。“从系统化的知识之树上摘下的苹果太多了，会使进步衰退。”^④沿着马克思指明的思想道路前进，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精神是对“历史科学”的不断拓展并以此变革现实，最大限度规避“这个科学的建筑最后必成为空的架子，徒然分享着哲学的虚名和伪号”^⑤的学术衰退。文本阐释学中的“当代性言说”，也就需要拓展“思想创造”的视域，善于将“文本诠释”的思想合法性上升为“思想构境”的总体澄明。

“历史科学”是朝向人类解放的思想叙事，是在批判“历史”中开启人类文明历史的起点。在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看来，“马克思关于历史的观点的苛刻性，对社会进程阴暗面的坚持，对需要长期的、乏味的、痛苦的劳动的坚持，他的反英雄论的现实主义，辛辣的、反讽的警句，刻意的和猛烈的反理想主义的语调，它们本身就是这个时期巨大的感情和智力炎症的受欢迎的解毒剂”。^⑥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彻底的，正是因为“彻底性”而遭遇到现实世界因狭隘利益牵绊的诸多人的诟病，因为“革命性”而遭到各种修正主义者的“诋毁”。马克思的思想是真实对待人类历史并朝向人类未来的，马克思的思想文本没有“遮蔽马克思”，正是因为“误读马克思”和“误解马克思”才有了“被遮蔽的马克思”和“被遮蔽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在扎根中国、着眼世界、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基点上创造具有中国自主特色的知识体系，不仅意味着要以厚实的文本积淀“回到马克思”，夯实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的基本功，更要在尊重文本、吃透文本、贯通文本的基础上激发经典文本的“思想世

①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9页。

②⑤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3页。

④ [英]怀海特：《思维方式》，刘放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54页。

⑥ [英]以赛亚·伯林：《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潘荣荣、林茂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67页。

界”,在减少误认或误读的同时阐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逻辑和时代价值。

(三)“思想创造”的价值旨归:从“思想阐发”到“文明创生”的实践变革

新的历史基点上“走进马克思”,在一定意义上体现总体性解答“时代之问”之于“中国思想”的吁求,体现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对“思想史研究”的重视。如果说21世纪初“回到马克思”的学术自主意识是之于走出“教科书体系”的方法论变革,那么,在思想资源“质性积累”的基础上,更能理解“回到马克思”是直面“马克思思想何以出场”和“马克思如何走向当代”之“归基”工程的思想史意义。新时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不断拓展,随着学科队伍和研究群体的扩大,要在既有拓展性研究基础上进行“创新”,而不是纠结于对经典文本之“千锤百炼”的挫败感和“步履蹒跚”的无力感。这一意义上的“中国思想”创生,孕育着从“思想阐发”的理论彻底到“文明创生”的实践变革。

思维自觉和思想成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识。“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①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变革的先导,思想创造是文明创造和文明进阶的时代呼声。思想的时代出场需要“猫头鹰”和“高卢雄鸡”的时空呼应。“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概念所教导的也必然就是历史所显示的。”^②时代变革呼吁“思想史研究”能够提供“当代性言说”的“未来之境”。思想是历史性的,思想史研究是之于“历史意识”的存在之思。一是以“大历史观”来看,人类社会发展总是需要进步思想引领的,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及其“思想坐标”不会因为其特有的“思想预言的结构”而被简单地归认为“不合时宜”的乌托邦主义。思想本身是批判性的,“思想史研究”是之于“视界融合”和“思想阐发”的文明创造。二是从“文明史”来看,马克思毕生聚焦“工业文明”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解剖学革命”,并基于“历史科学”的对象域对人类“史前史”以及人类未来文明形态进行思想布展。思想总是未来式的,“思想史研究”是之于“历史意识”的“当代性言说”。三是从“学说史”来看,一切历史的精华最终是思想史,回到“思想史”的时空坐标和意义空间,有助于纵览人类文明演进过程的艰涩和曲折,有益于洞察人类自觉创造历史的思维力量和文明进度。

总之,将文本间距、思想转承与意义空间作为结构性“阐释框架”的方法论探析,最终指向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自觉。有了如上分析框架的知识性铺陈,进而以“思想史”的内生逻辑来推进“思想考古”意义上的“思想创造”,也就有了实质性的时代内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审视,本质上是对如何“读懂马克思”的历时性求解:一是理解思想家的心路历程和思想逻辑,实现经典文本之于“诠释合一”的思想澄明。二是打通经典文本和思想史的内在脉络,夯实“文本耕犁”与“论从史出”的逻辑支撑。三是把握文本诠释和思想阐发的“中道原则”,以合乎文明创生的“历史意识”予以辩证分析。四是把握思想出场和思想发展的“意义空间”,在思想创造的“有机性”上展开“当代性言说”。一言以蔽之,“读懂马克思”不是之于单纯话语叙事意义上的“返本求真”,而是基于“历史科学”之“思想预言的结构”的“返本开新”,从而增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阐释权和话语权。

(责任编辑:林日杖)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7页。

^②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6页。